



王衛明 著

大聖慈寺畫史叢攷

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聖慈寺畫史叢考

八十八史會堂題



J 228.6

王衛明 著

大聖慈寺畫史叢攷

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聖慈寺畫史叢攷/王衛明著.—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5.3

ISBN 7-5039-2628-7

I.大... II.王... III.寺廟壁畫—繪畫史—中國—五代十國時期 IV.K87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020904 號

大聖慈寺畫史叢攷

著 者 王衛明

責任編輯 李世耀

責任校對 李惠琴

裝幀設計 海 洋

出版發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陽區惠新北裏甲1號 100029

網 址 www.whyscbs.com

電子郵件 whysbooks@263.net

電話傳真 (010)64913345 64813346 (總編室)

(010)64913384 64813385 (發行部)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張 20.75

字 數 300千字

書 號 ISBN 7-5039-2628-7/J·708

定 價 42.00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印裝錯誤，隨時退換。

引 言

成都是國務院首批公佈的全國二十四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自秦、漢以來一直是中國西南最大的都會和軍事重鎮。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地靈人傑，歷史上被譽為天府之國。但作為文化古都，攷察其歷代遺留下來的名勝古迹，大多由於歷次的火災、水患及兵燹等諸原因，地上所留遺存甚少。就寺院來說，成都市內現存的數座建築古迹，亦多是清代以後修復而成的遺構。

四川自唐代以來，相對遠離中原的西蜀地區，作為西南首屈一指的文化繁榮之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其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徵，則是佛教文化的發展達到了未曾有的殷盛。而促使其發展成為全國矚目之水準的背景，則是成都城內存在的數座古老而巨大的佛教寺院，大聖慈寺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名剎。它在成都城內位置最中，寺地占有面積最廣，擁有僧侶陣容最大，且創作佛教藝術品最多。

大聖慈寺，從唐代始源，至今已有千年以上的經歷。尤其是唐、五代、兩宋時期的數百年中，寺中出現了無以計數的建築物、雕塑造像、壁畫及碑刻、經藏。這些於寺中源源不斷創出的精神文化的產物，時時積極

地向外界傳播，影響到全國文化發展的各個領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是大聖慈寺中歷朝出現的、由龐大的藝術家陣容所繪製的大規模佛教壁畫作品。作為唐宋期佛教美術史的研究課題，探討這些壁畫作品的存在價值無疑是極為重要的，但遺憾的是，隨着寺院遺存逐漸地從地上消失，這些壁畫作品早已湮沒不傳。在沒有可靠作品依憑的困難的研究環境中，大聖慈寺這一寺院本身，在佛教美術史上的存在地位與意義，亦從我們的關注範圍中隨之消失了。

在中國文化史上，繪畫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繪畫門類中，壁畫又是發生最久遠、持續創作時期最長的畫種，成為中國美術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因而唐代張彥遠在所著的第一部中國美術史《歷代名畫記》中，闢有壁畫專章，對隋唐時代的京畿寺院的壁畫製作狀況詳加記述。成都城內的大聖慈寺，自唐至德年間（756—758）始創以來，伴隨着大規模的殿閣的建造和配置造像，從全國各地集中而來的大批職業畫家，在此從事了歷時數百年之久的、殿堂內的壁畫創作。這些無以數計的壁畫無疑展示了唐宋期整個時代的宗教史、藝術史及文化史多領域的發展面貌。又正像上述的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卷三“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一樣，宋代成都地方文人黃休復亦撰《益州名畫錄》、南宋的范成大在任職成都期間著有《成都古寺名筆記》，不僅以專著形式記述或著錄了大聖慈寺的壁畫創作的詳情、兼又涉及畫家們的創作經歷及風格所長。這些記錄，不僅是研究大聖慈寺壁畫創作的第一手資料，也為攷察當時處於中世繪畫發展之頂點的西蜀畫壇中佛教美術製作的形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攷依據。

本書就以往在古代繪畫史研究中尚未特別加以詳述的成都這一特定地區所發生的佛教美術現象作一補足。作為攷察中國中世佛教美術於西蜀發展的一端，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發展綫索脈絡與淵源流變最清楚的大聖

慈寺繪畫創作的實態，包括畫家、作品及製作環境及信仰形態等蹤迹，從文獻和作品兩面加以論證。此外，亦對圍繞着大聖慈寺發生的若干佛教史、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問題做些必要的論述。

關於記述西蜀地區繪畫史發展的若干篇唐宋期的美術史料，由於長年尚未從文獻學的角度加以系統的整理，本書在以這些美術史著述作為攷察大聖慈寺繪畫史的基本史料的同時，並設專章對文獻中的基本問題作了必要的攷證和整理，對重點篇章又作了盡可能詳細的注釋，藉以澄清畫史著述上的矛盾，以便提高所據資料的可靠性。由於這些史料多直接記述了大聖慈寺的重要史實，因而研究繪畫史料本身，則也應是攷察大聖慈寺繪畫史發展面貌的一個必不可缺的環節。

因此，本書將從唐宋時期的西蜀佛教美術史和繪畫史料學兩方面入手，對大聖慈寺的寺史變遷與佛教美術史發展上的諸問題作深入探討，並對作畫於大聖慈寺中的數位畫史上影響深遠、且又無真迹和摹本流傳的畫家事蹟求諸於現存史料尋流溯源，以說明西蜀繪畫發展之動因。各章節中因引用歷史文獻較多，由於篇幅原因，沒有再過多地用白話重復其內容。同時注釋中不少引用了日本近年發表的學術成果，意在為國內的同行提供一些在同學術領域中日本國內研究的大致狀況。本書所記內容，因涉及領域寬泛，時代跨度又大，議論難以深刻、周全，但力求書中繪畫史方面的分析，能深入揭示和理解西蜀地區藝術史縱橫多歧的發展迹象。筆者希望能從本書的敘述中，能為同行從某一特定的角度提供一絲綫索，以充實和深化美術史學界對唐宋時期、某一特定區域佛教美術史變遷之過程及發展始因的認識。

目 錄

引 言	1
第一章 西蜀地區文化興起的歷史背景	1
第二章 成都大聖慈寺的成立和發展由緒	13
第一節 成都地區諸寺院的成立及發展狀況	14
一、昭覺寺	14
二、聖壽寺	16
三、淨衆寺	18
四、祥符寺 (另見前出聖壽寺項)	21
五、安福寺	23
六、聖興寺	24
七、寶曆寺	25
八、金繩院	26
九、梵安寺	27
十、信相院	29
十一、移忠寺	30
十二、中興寺	31
十三、鴻慶寺	32
十四、應天寺	33
十五、多寶寺	34

第二節	大聖慈寺的初創與建置沿革	38
一、	大聖慈寺的緣起與初創	39
二、	大聖慈寺的歷史沿革	45
第三節	大聖慈寺的齋會及文化娛樂活動	53
一、	大聖慈寺與唐、五代皇室的關係	53
二、	大聖慈寺的民間文化及商業活動	56
三、	宋代文人、墨客對大聖慈寺的詠讚	62
第三章	有關大聖慈寺繪畫史料上的問題	70
第一節	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	70
一、	蜀沙門仁顯撰《廣畫新集》	73
二、	辛顯撰《益州畫錄》	75
三、	徐鉉撰《江南畫錄拾遺》	77
四、	黃休復撰《總畫集》	78
五、	《圖畫見聞志》中所見大聖慈寺的繪畫史料	81
第二節	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	96
一、	《益州名畫錄》版本著錄上的問題	96
二、	關於著者黃休復	100
第三節	范成大的《成都古寺名筆記》	102
第四節	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	110
第五節	費著的《蜀名畫記》	113
第六節	鄧椿的《畫繼》	119
第四章	《益州名畫錄》和《成都古寺名筆記》中所見大聖慈寺畫史的問題	130
第一節	大聖慈寺壁畫創作的崛起與淵源	138
第二節	大聖慈寺壁畫創作之唐代中興	
——	范瓊、趙公祐、左全	144

第三節	大聖慈寺壁畫創作風格的變異	
——	張南本和孫知微	150
第四節	大聖慈寺壁畫表現題材的多樣化特徵	164
一、	密教題材	165
二、	冥界十王信仰的問題	169
三、	觀音像和天王像的流行	180
四、	世俗主題的出現	191
第五節	大聖慈寺的壁畫創作與西蜀宮廷作畫機構	199
一、	五代以前的宮廷作畫機構	200
二、	西蜀宮廷畫家中的大聖慈寺壁畫創作	204
第六節	從史料上看大聖慈寺壁畫的流變與保存	211
第五章	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筆記》注釋	224
附 錄	大聖慈寺歷史簡略年表	311
結 語		315
後 記		319

第一章 西蜀地區文化興起的歷史背景

唐末的黃巢農民起義，造成了中國各地群雄割據的局面。雖然僖宗自四川歸京，唐朝再次收復了長安，但大唐的權威和向心力則喪失殆盡，唐王室實際已淪落成爲一地方政權。從光啓元年（885）至天祐三年（906）的二十餘年的混亂中，唐朝的一元化的貴族官僚體制被打破，相繼登場的則是在激烈的兼併戰爭中稱雄於各地的武人節度使出身的方鎮軍閥，他們在霸權爭奪戰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統治地域。在唐朝滅亡後的約半個世紀中，中國繼南北朝時代之後再次出現了分裂局面，即所謂“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這一分裂與戰亂的時代，至公元906年北宋的統一才宣告結束。

在五代十國中，偏安於四川的前、後蜀政權，倚仗着其固有的自然地理條件，“亂中有治”地將政權維持到北宋的全國統一之時。公元907年，王建借朱全忠稱帝爲由，立國號爲“蜀”，是爲前蜀高祖。在其十九年的治世中，他在加強四川各地要塞防禦的同時，還積極網羅從中原戰亂地區避難而來的貴族士人，並利用以鹽、鐵爲中心的四川物質財政優勢，使政權獲得了一度的穩定。前蜀滅亡後，從孟知祥任西川節度使到後蜀立國，前後共計八年。這期間，他一面抗擊來自於後唐明宗的壓力，一面兼併川東地區，使西蜀戰火四起，四川社會一度出現了不安定的局面。公元934年，孟知祥借明宗歿而乘機稱帝，是爲後蜀高祖。及二代孟昶執政，內政雖腐

敗，但當時中原地區正值後晉至後漢的政權交替時期，中原王朝則無暇四顧，孟昶趁機收復了秦、成、階、鳳等曾屬前蜀支配地域的四州，先後維持了近三十年的統治。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後，孟昶欲結以山西為據點的北漢政權拒宋而遭失敗，公元965年遂被北宋所滅。前、後蜀經歷帝王四代，凡五十一年。

衆所周知，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四川地區是具有獨特位置的歷史舞臺。今日四川所轄的大部分地區，古稱之為巴（重慶地區）蜀（成都地區）。秦併巴蜀後，置巴、蜀二郡。漢置益州；唐分劍南道為東西二川；宋分益、梓、利、夔四路為地方行政地區，史謂之川陝四路。約從宋代始，則出現了“四川”這一地理稱謂。^①再從地理條件來看，古代文人稱四川盆地“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獐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彊；^②其四面皆被高山所環繞，北接秦嶺山脈，南向雲貴山地；東出長江三峽，西鄰青藏高原。因此，四川則被這稱做“四塞”的地勢所隔絕，交通自古極為不便。也正是由於這一特點，此地區自古以來一直保持着獨自的文化傳統。秦統一天下後至西漢時期，政治開始穩定，生產力不斷提高，城市的建設和工商業的發展，促使巴蜀與外界溝通交往，巴蜀與中原的聯繫得到加強。同時從中原移住巴蜀的漢人亦絡繹不絕，在當地富庶的自然資源的厚惠下，共同為以後四川的社會發展積蓄了財富，經濟的發展則為文化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四川地區未像中原那樣遭受過歷代王朝在政權交替時的兵火洗禮，社會的相對穩定也為人們追求的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及文化事業的向上提供了先決條件。西漢王朝在秦郡縣制的基礎上繼續增擴其在巴蜀的行政建置，曾先後在四川設有八郡五十六縣，多半隸屬於益州，完成了四川地區最初的基礎地方管理機制。而至唐、五代、兩宋時期，四川地區的經濟空前發展，人才聚集，文化事業十分發達，在古代史上是繼秦漢以來的又一個高峰時期。正如初唐

文人陳子昂所說：

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③

正因為四川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及自給自足的富庶的經濟基礎，因此在“安史之亂”和“黃巢之亂”時，唐玄宗和僖宗兩人均先後出亡成都。至唐代後期，成都與長江下游的揚州，則並列為當時全國最富盛名的工商業繁榮都市。唐人盧求撰《成都記序》中云：

大凡今之推各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④

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亦云：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中略）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⑤

足可見長江上、下游的這兩個都市在唐朝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處的位置。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四川地區先後處在前、後蜀支配地域，未受到大的戰亂破壞，社會相對穩定，使經濟文化能夠得到持續的發展。與此同時，西蜀政權的文物典章皆襲唐制，尤重視文化娛樂事業的經營，使西蜀的社會生活水準達到了新的高度。至宋代，中原王朝收復四川以後，亦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管理與經營，使之持續成為當時中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對宋代四川地區經濟發達之狀況，北宋的呂陶《淨德集》卷十四《成都新建備武堂記》中說：

夫蜀之四隅，綿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力貢賦，率四海三之一。^⑥

而這些因手工業的發達而積蓄的財富，又通過當時發達的漕運及陸運源源

流入內地及京師。元馬端臨《文獻通攷》記爲：

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網吏運送京師。^⑦

又張澍《蜀典》卷六引《成都古今記》，記成都一年中的集市貿易爲：

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六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可見蜀中物資的豐富所帶來的商品交易的興盛。

五代及宋代的西蜀地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不僅帶來了商品貿易的繁庶，又由此而產生了市井遨遊宴樂的廣泛普及，致使西蜀社會中的文化意識獲得了復興和提高，這一社會環境，爲高次元的思想、文化的進一步完善創造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良好條件。正如清初編纂《四庫全書》的四庫館臣在著錄記載宋代四川地區民間遊樂風俗的著述《歲華紀麗譜》時，總括唐宋時期西蜀文化發展之現象時所稱：

成都自唐代號爲繁庶，甲於西南。其時爲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優閑，歲時燕集，寢相沿習。(中略)遨頭行繁之說，今尚傳之。迨及宋初，其風未息。前後太守，如張詠之剛方，趙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廢娛遊。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風流，亦往往傳爲佳話，爲世所艷稱。^⑧

文中道出了當時作爲西南最大都會的成都，其社會經濟的富庶而導致追求侈華的社會風氣的出現，爲傳統文化、特別是文藝生活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豪族、文人、士大夫以至庶民階層，對文學藝術的關注、對民間文藝好尚的追求，則成爲這一時期“民物殷阜，歌詠風流”的文化現象形成的直接原因。從另一角度看，蜀中的奢華遊樂之風，又可說是四川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如前述，四川地區雖有着優越的農業及工商業發展環境，但

由於自然條件的制限，耕地面積相對狹小，社會財富的剩餘部分，既不可能大規模投入到手工業生產及商品貿易交往之中，以擴大經濟規模，也不易投入購置大量土地。因而，社會所積蓄的財富，多流於再消費的文化娛樂之中，而統治者階層，則毫無顧慮地消耗其社會財富，使奢侈之極的遊樂之風在蜀中漫延，而逐漸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宋人韓琦曾在《安陽集》中記云：

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張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遊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①

足可以看出蜀中其侈華享樂之風氣已經釀成了一種社會現象。

歷時百餘年的唐末、五代及宋初時期，文化藝術在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中亦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無論是江南還是北方中原，盡管社會政治正處在混亂期，但諸王朝的執政者均對文學藝術等精神生活抱有深厚的憧憬，以此為原動力，藝術家們也得以獲得較安定的環境而致力於藝術創作，從而遞進了中國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期。就美術史的發展而言，這一時代繼承構築了藝術史上黃金時代的盛唐傳統，以宗教為主題，繪於寺觀壁面上的道釋人物畫創作則一直成為造型藝術活動的主流。與此同時，更具有觀賞價值的山水和花鳥畫，也在繼承唐代傳統的同時逐漸形成了獨立畫科。特別是西蜀地區，自中晚唐以來不斷有京畿地區的書畫家入蜀，朝廷內又設立有宮廷畫院，人才濟濟，名手如林。加之佛教信仰的流行，寺觀壁畫的繪製尤盛。而壁畫主題中又多注重表現清新舒悅的現實生活及有勸戒意義的歷史傳統題材，這些現象都為西蜀繪畫黃金時代的到來具備了條件。

如前所述，西蜀地區古來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社會文化沒有更多地受到中原那樣的戰火摧殘，富裕的人文資源、國家的一定期間的安定，創造了西蜀繪畫繁榮的先決條件。南北朝時代，成都雖是南北政治勢力角逐

的中心，但由於篤信佛教文化的南朝諸國在四川的不遺餘力地長期經營，其佛教文化的餘波又經周邊諸國不斷傳入，促使成都很早地便成為綜合型的西南大都會。此外，應該指出的是，中、晚唐時期，因避“安史之亂”和“黃巢之亂”，唐玄宗和僖宗都選擇四川地區避難存生，而隨唐皇帝蒙塵於蜀、並此後在此定居的，包括了衆多的文人，士大夫、僧侶及專業藝術家，他們把中原京城的佛教文化、唐代的宮廷趣味、京師的造型傳統等帶至四川，為以後西蜀地區文化藝術前所未有的繁榮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對於唐代的書籍文獻及書畫為避兵火之災而流落蜀地之事，宋人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卷上“趙德玄”條中有如下敘述：

趙德玄者，雍京（長安）人，天福年（後晉高祖石敬瑭，936—943）入蜀。（中略）入蜀時將梁、隋、唐名畫百本，至今相傳。蜀因二帝駐驛，昭宗遷幸（天復元年，901，朱全忠之亂），自京師入蜀者將到圖書名畫，散落人間，固亦多矣。杜天師（光庭）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德玄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迹，無非秘府散逸者，本相傳在蜀，信後學之幸也。^⑩

由此可以看到，在唐末動亂之際，中唐的皇室貴族及京城的一流畫家，多攜携大量的圖書名畫、儒書經卷等秘府收藏入蜀避難，而當地的畫家們則以這些流散於西蜀民間的粉本、墨迹等為範本，充實其創作，使西蜀繪畫的水準達到了新的高度。至後蜀孟昶的明德二年（935），皇室以前代積蓄下來的內廷圖書庫收藏為基礎，設立了中國繪畫史上最初的宮廷畫院——翰林圖畫院。在宮廷中從事創作的畫家陣容中，從京城移住此地的，則有趙溫奇、趙德齊、趙忠義、杜巖龜、高道興、蒲師訓、杜敬安、呂嶢等見諸於畫史的著名畫家。這些職業畫家又多是以京城盛行的道釋人物為擅長。他們置身西蜀畫壇之前沿，為西蜀的佛教壁畫創作繁榮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始，由高僧大德的傳教而導致佛教信仰在蜀中各地

盛行，亦為巴蜀佛教文化的發展帶來了重要的轉機，同時也為西蜀佛教美術的興旺發達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作為佛教美術發展的歷史背景，東晉名僧慧遠之弟慧持於隆安三年（399）“辭遠入蜀”，住於成都龍淵寺，於是“大弘佛法，并絡四方，慕德成侶”，蜀中人士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①劉宋時期最初入蜀的高僧則是長安的釋曇弘，據《高僧傳》卷十一釋玄高傳記載，曇弘與玄高在麥積山“稟其禪道”，此後“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②曇弘則把長安的禪學帶至成都。劉宋元嘉（424—453）中，有涼州禪僧釋法成人蜀，東海王懷素“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佛法”。^③《釋迦方志》卷下遊履篇記釋智猛：“東晉後秦姚興弘始年（399—416），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鄯諸國至剽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經二十年，至甲子歲，與伴一人還東，達涼入蜀。宋元嘉末年卒於成都。”^④《續高僧傳》卷十一釋道法傳亦載敦煌人釋道法：“起家人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咒，後遊成都，（中略）為興樂，香積二寺主。”^⑤由此可知由西陲而來的僧人亦多止於成都。

自六世紀以後，蜀中佛教不僅注重義學，更注重文辭玄理，廣泛傳誦經典，對民衆產生了具大的影響。如曾赴梁都金陵弘揚佛法的釋寶海，與梁武帝“論佛性義”，大受武帝賞識。返蜀後，住於成都謝鎮寺，則“大弘講肆”。^⑥資中人釋智方，“童稚出家，止州廓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曾在京城講授《法華經》與《寶塔品》。^⑦由於巴蜀地區僧侶眾多，人才倍出，西魏收取巴蜀後，皇室將大批巴蜀高僧迎至長安，又使得京城與西蜀的佛教文化得以溝通。據《續高僧傳》卷十六釋僧實傳載：（北周）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⑧蜀中由於同多邊地區的直接交流，使其佛教發展在當時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這種深厚的信仰傳統為唐代佛教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